



JIEFANGJUN
WENYI CHUBANSHE

陈毅元帅的 最后岁月

铁竹伟 著



纪实文学精选

991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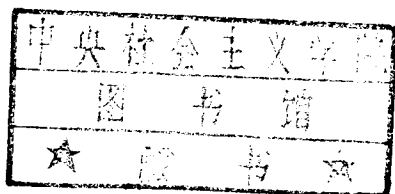
K125.2
257



200232514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

铁竹伟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DK33/1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铁竹伟著. —2版.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1

(纪实文学精品系列)

ISBN 7-5033-0018-3

I. 陈… II. 铁…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②陈毅—生平事迹 IV. I25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北京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7年3月第2版 1998年1月北京第3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625

字数:232千字 印数:12,501—17,500

定价:12.80元(膜)

序 言

王 震

陈毅同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投身中国革命，不久即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名将。全国解放后，他领导建设新上海；接着，在外交战线上叱咤风云，成为二十世纪国际上杰出的政治家、外交家。在陈毅同志光辉的一生中，这些无疑占着十分重要的位置。但是，他还有着更加显赫的一页，这就是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辉煌业绩。

我有幸在“文化大革命”这艰辛的年代较多地接触到陈毅同志。我听到他说过：“如果我乖乖的不说话，在中南海是住得下去的。”“我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我要说话！”

在中国革命的多次危急关头和转折时期，陈毅同志坚定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与敌人战斗，这是很不容易的。而在十年内乱中，陈毅同志又一次站到斗争的最前线，忠诚地、英勇地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原则，捍卫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这是更加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大家铭记和学习。

这本书搜集了大量的材料，把“文革”中的陈毅同志写得栩栩如生，气势磅礴。对周总理、老师们和其他同志的描述也都动人。写的虽是惨遭浩劫，但充满着浩然正气和革命乐观主

义的情操,读着使人沉思、振奋。尤其是对陈毅同志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为党为国直言无讳的精神,写得比较突出和生动。

我们战斗的共产党需要这种精神。

我们改革的时代需要这种精神。

我推荐这本书的用意主要在此。

1985年1月8日

目 次

序 言	王 震
序 章	(1)
第一章 工作组是中央派的,我投的是赞成票	(11)
第二章 我就是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运动	(34)
第三章 只要我不吭气,住在中南海是不成问题的	(60)
第四章 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	(83)
第五章 我以犯错误比你们多的资格向你们讲话	(116)
第六章 周总理对我的指示:“陈毅不要讲话!”	(136)
第七章 把我揪出来示众好了,我不愿当这个 “干净”.....	(156)
第八章 我是右派还是左派,历史最终会弄清楚	(188)
第九章 我坚持我的看法。这个观点一定要报 给毛主席.....	(217)
第十章 说我讲了要跟陈伯达战斗在一起, 那是造谣.....	(238)

第十一章	我 71 岁,又得大病,但雄心壮志犹存	(261)
第十二章一直向前.....战胜敌人.....	(282)
第十三章	最后是追悼会,当然是别人开,自己 不能参加了.....	(312)
代后记	向 224 位老师致军礼.....	(324)

序 章

本书的任务，本来只是报告陈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亦即他一生中最后一个阶段所发生的种种故事，然而在开篇，作者却不能不把镜头拉回几年。因为这期间有几件事情，是想了解“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陈毅的人所不应遗漏的。

第一件事发生在1961年3月，也就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继而全党开展反右倾斗争之后，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做自我批评之前。3月22日，在中南海的紫光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物中，有一位居然坐在蒙着白台布的会议桌子后面说：

“不仅过去的时代有局限性，我们这个时代也有局限性。封建阶级有局限性，资产阶级有局限性，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我们只能尽量做我们这一代所能够做到的事，不是说一切事情我们都能够做。……今天，在农业方面，有人想很快就跳到共产主义，刮共产风，犯了错误……就是毛主席也不能超过今天的时代去解决问题，否则就要犯错误。”

听众的神情顿时紧张起来。百十来人的会场上，只有钢笔在本子上疾速划动的沙沙声。自从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来，

人们什么时候听到过这种论调啊！

讲话的人却很从容。他今年快满60足岁，可是精神矍铄、健旺，额头高高的，满面红光。他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军委副主席陈毅元帅。

这次文化人的聚会，正是由陈毅提议召集的。

那时候，在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意识形态领域，则对一些艺术作品、学术观点和文学艺术界的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对文艺创作粗暴干涉的现象相当严重。

陈毅有不少文化界的朋友。他们曾向他述说自己的苦衷。有些单位的领导，自己的文章都没写通，却随便去改人家的文章，把通的改成不通。还有些单位的领导，一味要剧作家跟形势，为政治运动写戏，还要求写出戏剧冲突，写出矛盾。剧本一拿出，只要出现有缺点的领导或对现实中落后面的批评，马上有人“对号入座”，顷刻之间，“反党”、“对社会主义制度不满”的大帽子从天而降。报纸杂志上点名批判、围攻，继而被“拔白旗”、受处分，甚至开除公职，送往劳改……弄得作家们终日惶惶然。有的作家转而去写历史剧，无奈写历史剧也不太平。一次，陈毅应邀观看新编京剧《宝莲灯》。名噪几世的《二堂放子》一场，无论唱腔、作派都堪称一绝，陈毅十分爱看。不料，戏至尾声仍不见这场戏出现。编剧一旁苦笑着解释：为了体现“群众路线”，他已奉命删去了“二堂放子”一场。陈毅真想骂人！干脆让神话里的人物也读《资本论》，岂不更革命吗！我们的天下，这样搞下去，正如毛泽东所说，要“霸王别姬”啊！

陈毅终于隐忍不住。他亲自打电话给齐燕铭，建议召集一次在京戏曲编导工作者座谈会。他要出席讲话。

既要讲，就要讲彻底，讲痛快，钝刀子割肉的“谈话”，陈毅从不愿讲！

“我看到有些文章把古人骂得一塌糊涂，把李清照完全否定了。李清照当然有她的局限性，她不可能超过那个时代去解决问题……有篇文章讲陶渊明，为什么当时不去和九江、鄱阳湖的起义军结合，却坐在那里喝酒，因此认为陶渊明的诗一无是处……”

“那些黄色的东西，宣传愚忠愚孝的戏，进行反动宣传，是不好的。但是也不要现代的意识形态加在历史剧和旧剧里面，给古人穿起‘西装’，穿起‘人民装’；不要到那里去找马克思主义，找毛泽东思想。……”

“不仅历史上的人物都有缺点，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也都有缺点。毛主席从来没讲过他没有缺点。……我们今天不要把毛主席神化。凡是把毛主席神化的人是别有用意的。……”

敏感的文化人不可能听不出来，陈毅讲的是戏曲，但又都是政治，是当前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这正是党的“八大”的精神。陈毅一贯坚持我党30多年来进行反“左”、反右两条战线斗争的优良传统，在革命的转折关头，总是“评衡‘左’右费思量”。解放初期，当“左”的倾向在党内部分同志中抬头的时候，陈毅市长曾说出“只敢反右，不敢反‘左’，就不能算一个好的共产党员”的名言。如今，当“左”的错误在党内尤其是在领袖的言行中日益发展，党和国家的命运面临

严重考验的时刻，陈毅再次挺身而出讲话了。

场内不时爆发出时而畅快、时而惊愕的笑声、议论声。到会的人无不受到强有力的震动。但这还是一次小范围内的讲话。而震动了全国，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一桩公案的“广州会议讲话”，则是在一年以后。

1962年3月2日，全国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广州召开。周恩来和陈毅接受大会邀请出席了会议。按照大会议程，开幕时，由周恩来总理作报告，随后转入小组讨论，打算最后根据大家提出的主要问题，由陈毅副总理再作一次报告。

这时已是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在广州会议的讲话中，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著名论断。于是，在小组会上，科学家、剧作家们纷纷将几年来遭受的委屈、憋在心头的苦闷和盘托出。谈到伤心处，说者痛哭失声，听者泪流满面。

一份份“诉苦”、“出气”的简报送到陈毅手中，他一读之下，竟然两夜无法安眠。开会前，他也了解一些情况，但是，现在手边的材料仍然令他震惊：被“拔白旗”点名批判，乃至开除党籍遣送劳改的人数，竟占了与会代表的大部分！他不能不为问题的严重性担忧：党对知识分子是关怀信任，还是猜疑、歧视、打击，这不仅仅决定着科学界、文化界的前途，更重要的是，它直接关系到六亿人口的大国、穷国，能不能繁荣富强，关系到党在“八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伟大历史任务能否实现！

这一天，羊城宾馆会议厅里人声鼎沸，气氛激昂。参加座谈会的科学家、剧作家们正翘首盼望陈毅的到来，急切希望听

取他的报告。根据陈毅去年在紫光阁的讲话，他们深信陈毅这次讲话，决不会避开大家心头的疙瘩。他们的赤子之心，不仅需要理解和安慰，更需要获得驱散心头迷雾的力量！

热烈的掌声中，陈毅在铺着白桌布的主席台落了座。他双臂伏在桌上，既没客套，也不寒暄，单刀直入，谈起诸位最关心的问题：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

“……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

讲到这里，陈毅立起，向全场的科学家、剧作家深深鞠了一躬。

台下掌声雷动，一双双眼睛含着泪水。

“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带来的考验，还是不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还是对共产党不丧失信心，这至少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心！”

陈毅炽热的感情，知心的话语，把许多人心头的寒冰，化为两颊上滚烫的热泪，有人忍不住呜咽出声。

突然，陈毅的语调变得激昂起来：

“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共产党也太没有眼光了！同志们，要懂得今天共产党在世界上还不是占优势，要消灭帝国主义，还需要作长期的严重的斗争，因此要很好地团结人。团结的人愈多愈好！今

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共产党不尊重文化、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共产党不尊重科学这类话，不晓得是马克思讲过？是恩格斯讲过？还是列宁讲过？毛主席讲过？谁也没有讲过这个话！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笑声、掌声，又是笑声……据当年会议的记录稿注明，在陈毅作这篇三万三千字的报告期间，会场里响起六十多次掌声和笑声。

花城广州，正值阳春3月。代表们脱下了冬装，满怀春意而归。但是，他们仍有担心——心头的冰块虽然在广州融为春水，回去之后会不会又结成冰？

陈毅从广州回到北京，立即忙于外事活动、出席政协会议，很少有闲暇在家。这天晚上没事，正巧一位亲戚从南京到北京出差，饭后，家人会聚一同聊天。陈毅问起南方情况，那位亲戚说：“最近军区传达了您在广州的讲话。”

“噢？”陈毅很感兴趣地问，“你听到什么反映了？”

那位亲戚略显踌躇，但禁不住陈毅催促的目光，直率答道：“讲好话的有。不过也有人说，去年紫光阁会议上讲无产阶级也有局限性，今年又对知识分子行‘脱帽礼’，要不是听到陈毅的大名，还以为是右派分子在说话呢！”

“右派分子在说话？！我陈毅是大右派？！”陈毅点着自己鼻子，不禁仰面大笑，“我这些讲话的提纲，都是请示过毛主席的，我还留有充分的余地嘞！我是大右派，那毛主席又是什么呢？！哈哈……”

大家都笑了。那位亲戚又补充了一句：“听说，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下了指示，不许传达你的讲话。”

“这我知道。”陈毅只应承一句，便岔开了话题。党内领导层的事，他不便向亲友说。但是他心里清楚，并不是全党都乐于听到知识分子的笑声。

从1962年夏季开始，“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越喊越响，这方面的“发明创造”层出不穷。“游动哨兵”江青组织批判了电影《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文艺事业不断受到沉重的打击。“突出政治”的大纛打起来了。断章取义的“语录”逐渐地风靡全国。陈毅再也没有公开发表有关意识形态的讲话的机会。暂时也无法知道陈毅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过些什么。对于这位在《冬夜杂咏》中写了“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的老党员、老军人，笔者只能从了解到的许多日常“小事”中，举几个十分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问题。

1964年的初夏，陈毅在北京西山休养，在陈毅“不做空头政治家”的思想指导下考进了“哈军工”的二儿子丹淮，突然出现在陈毅书桌前。陈毅眉眼绽笑，大声向里屋的妻子张茜招呼道：

“春兰，小丹回来了！他为什么回来？！是知道我病了，特地请假回来看我的。他也懂得孝敬了！”最后几个字，说得特别动感情。

饭桌上，陈毅问起学校最近有什么活动。丹淮据实告知：“正在开展反对不良倾向运动。”

陈毅不觉皱起眉头。

丹淮说：“组织我们学习林总‘四个第一’的指示。对了，同

学们有反映,说林总的讲话,与您经常讲的不一样。”

“嗯?是这样吗?”陈毅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像是要考考儿子:“你说说看,怎么不一样?”

看来丹淮最近想得很多,他有条不紊地说道:“您给我们说,您很赞成聂帅说的:‘现在我们党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的军队一样。’要求我们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您这两年在大学作的有关红专问题的报告,只要是报刊上能找到的,我都细细读过。您是一直提倡又红又专,反对空头政治家的;这与林总提出的‘政治第一’、‘我们要想办法发挥思想的力量来代替物质的力量’,怎么会一样呢?!”

陈毅眼睛里闪烁着笑意,不难看出,他对儿子的分辨能力是满意的。“你自己认为哪种对呢?”

儿子直率地回答:“现在流行的不是您的这种看法,不过,我觉得您说得也对!”

陈毅又问:“那么在你们同学中间,现在主要是不敢说‘红’呢,还是不敢说‘专’?”

丹淮说:“那当然是不敢说‘专’了。”

陈毅高兴地拍拍儿子的肩膀:“行,你们自己判断吧!只要对的,就听,别管一样不一样。”

陈毅随周恩来总理一起观看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剧中一位年轻工人,因为穿了一套148元的西装,被批判为忘记了阶级斗争,当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曾说过“社会主义不能穷得裤子也没得穿”的陈毅,在座位上不无烦躁地扭动着肩背。

演出结束后,大幕拉开,全场观众和演员,整齐地拍着巴

掌，等候中央首长登台接见。周恩来站起身，拍拍身边还坐着的陈毅，侧身往台上指了指。

陈毅摇摇头，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情绪：“我不能上台握手嘞！我身上这套西装，还不止 148 嘞！”

周恩来笑着小声劝道：“陈老总，去吧！”

陈毅看看总理恳切的目光，这才缓缓站起身说：“好，依你的，去！”

1965 年，陈毅参观外交部一个展览会，工作人员请他题词。他看看墙上贴着的“语录”，挺了挺眉毛，拿起毛笔，少等地沉思了一下，便大笔一挥，写道：

“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死背字句，脱离实际，犯教条主义的错误。陈毅”

就是这样一个“刚肠忌鬼蜮，迅雷发叱咤”的陈毅元帅，一个忠诚于党的“八大”路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突然被投入那场“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当然不可能不产生极富时代精神和个性特色的“戏剧性”情节。

当初在紫光阁会议上，陈毅讲到倾心处，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现在有一种恐慌，也许是无谓的恐慌，就是怕我一闭眼睛，人家把我的什么历史都抄出来，造我许多谣言。我有些害怕。我的一生也有许多忧患，并不那么顺利。当然，把我说得那么好我也不赞成。我只求那时对我有一个公正的评判。”

听众只是笑，并没有谁能领会陈毅的深意。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位忠诚刚正、战功累累、深受全国人民尊敬和爱戴的革命家，怎么会被否定呢？在他们的意念中，能打倒陈毅元帅的

人,恐怕上帝还没有造出来呢!

不,很遗憾:上帝已经造出来了……